

美国传教士赛兆祥汉语研习考察

邹王番、施正宇^[1]

摘要 美国传教士赛兆祥来华期间，在传播福音的同时，努力学习汉语，翻译宗教文献。赛兆祥在晚清来华西人创办的英文期刊《教务杂志》上发表了数篇有关汉语学习的文章，内容包括汉语官话与方言、口语及书面语、汉字拉丁化、汉语学习课程设置等方面。这些论述为当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赛兆祥；赛珍珠；汉语学习；教务杂志

美国传教士赛兆祥 (Abo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1880 年^[2]受美国基督教新教南长老会的派遣来到中国，足迹遍布江苏、浙江和江西，1931 年歿于庐山。赛兆祥曾在晚清来华西方人创办的《教务杂志》^[3]上发表了数篇与汉语学习有关的文章，并于 1913 年出版了自己独立翻译的《四福音书》；1929 年，他与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家、翻译家朱宝惠^[4] (1889-1970) 合作的《新译新约》出版问世。这表明赛兆祥不仅具备了较高的汉语水平，能够胜任传播福音和汉译《圣经》的工作，并且对西人汉语学习与教学有过一定的思考与贡献。

赛兆祥与妻子卡洛琳 (Caroline Stulting Sydenstricker) 一生共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不幸夭折，女儿赛珍珠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1892-1973) 是他们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长大后的赛珍珠不仅女承父业按立为教育传教士，而且成了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还分别以父亲和母亲为原型写作了传记作品《战斗的天使》(Fighting Angle) 和《异邦客》(The Exile)，作家的天性使赛珍珠在写作时为书中的父亲和母亲拟就了安德鲁 (Andrew) 和凯瑞 (Carie) 的名讳，通常这样的手法很难被看作是信史，但《战斗的天使》的扉页上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战斗的天使》系作者父亲之传记，是作者母亲传记《异邦客》之姊妹篇，两者并称“灵与肉”。

^[1] 邹王番，男，关西大学文学部非常勤讲师，邮箱：fw292993@gmail.com；施正宇，女，通讯作者，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邮箱：kuan@pku.edu.cn。

^[2] 或为 1881 年，详见黄光域：《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 (1807-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71 页。

^[3]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又称《中国纪事》、《中国纪事报》，是晚清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期刊，创刊于 1867 年，至 1941 年终刊，前后共出版了 73 卷，内容除了福音传播以外，还涉及到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典章制度、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是晚清时期关于中国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献。

^[4] 有关朱宝惠的信息，可参见[美]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中文修订版)，郭柳生：《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第 132 页。

因此, 书中的安德鲁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赛兆祥本人, 甚至有外国研究者直接把赛兆祥称作 Absalom [“Andrew”] Sydenstricker^[5], 书中有关安德鲁汉语学习细节的描述, 如果不是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 是很难杜撰出来的, 因此可以视为写作的作品。

一、赛兆祥汉语学习与汉语能力经历

目力所及, 笔者勾勒出赛兆祥汉语学习与运用的大致经历, 详见表 1。

表 1 赛兆祥汉语研习经历一览表

年代	年龄	事件			
1852	-	出生于美国。			
1880 (或 1881)	28 岁 (或 29 岁)	受美国南长老会派遣, 作为教育传教士携新婚妻子来华, 先后在杭州和苏州布道。			
1883	31 岁	奉派至镇江。			
1887	35 岁	奉派至苏北清江浦。			
		《教务杂志》	1887.3	Variation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of Northern and Central China	华北及华东方言口语之差异
			1887.4	Southern Mandarin	论南方官话
			1887.6	The Dialect of the River and Grand Canal	长江及运河流域之方言
			1888.1	Romanizing the Official Dialect	论官话拉丁化
1888	36 岁	1888.7	The Official Dialect	论汉语官话	
1892	40 岁	赛兆祥夫妇携刚刚出生的女儿赛珍珠返回中国。			
1908	56 岁	《教务杂志》	1908.7	Some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Guide the Missionary in His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传教士汉语学习指导诸原则
1912	60 岁		1912.4	Language Study Classes	语言学习课程
1913	61 岁	翻译出版《四福音书》。			
1920-1929	68-77 岁	与朱宝惠合作翻译《新译新约》(南京金陵神学院出版)。			
1931	79 岁	逝世于江西庐山牯岭别墅。			

^[5] Stephen K. Batalden, Kathleen Cann, John Dean: *Sowing the Word: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04-2004*, Sheffield: Sheffield Phoenix Press, 2004, p.121.

从上述年代看，赛兆祥有关汉语研习与圣经翻译的文献相对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80年来华到1892年女儿赛珍珠出生，这一阶段赛兆祥从28岁到40岁，是其人生的青壮年时期。

1880年，赛兆祥新婚燕尔，就携新娘踏上了来华的航船。赛珍珠写道：

安德鲁的蜜月是在跨越大西洋的轮船上度过的，航行途中他一直在为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而努力。他几个月前就开始学习汉语了。他每天都要拿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学习汉语，还要用几个小时学习希伯来语及希腊语。他总是用这几种语言研读《圣经》。^[6]

赛兆祥几乎是在28岁开始学习汉语的，这对任何一个语言学习者来说都已经过了最佳年龄，但凭着虔诚的信仰和超乎常人的语言感知能力，赛兆祥的汉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他对汉语投入了极大的热忱。事实上，他也有着很高的语言天赋。他醉心于汉语的纷繁复杂，例如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句调包括升调、平调甚至高平（level on an ascent）、降调和感叹，以及在词义和句法结构方面的细微差异。几乎没有白人能像他那样讲汉语，情真意切，甚至比母语还地道。^[7]

和普通的汉语学习者不同，赛兆祥对于汉语的学习并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技能的掌握上，赛珍珠写道：

他探究汉语字义的本源，……还开始学习孔子的经典著作，因此，他从一开始就掌握了汉语词汇优雅得体的表达方式。^[8]

赛兆祥看来生性执着，他字斟句酌，力求每一个发音都完美无缺，以至于会为妻子某些化石化石的错误发音而纠结烦恼：

然而他对所学的中文过于咬文嚼字，使得他的演讲充满了书卷气，以至于经常超出普罗大众的理解能力。凯瑞说汉语的时候有的字发音有些随意，我记得他对此发了一辈子的牢骚。他向我们抱怨说：“看你们的妈妈，怎么就学不会那几个发送气音的字呢？”他会央求她，因为对他那敏锐的耳朵来说，这简直就是巨大的折磨：“凯瑞，我求求你了，那个词发送气音——”

而她却不屑地反驳我说：“这有什么区别呢？只要他们能听懂，我就不会在乎了。更何况，老百姓比你更能听懂我说的话。”^[9]

1887年和1888年，赛兆祥在《教务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五篇署名文章，分别从汉语学习的角度探讨了汉语口语与书面语、汉语方言与官话、汉字拉丁化等问题。

^[6] Pearl S. Buck, *Fighting Angel*.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72, p.50.

^[7] Ibid, pp.51-52.

^[8] Ibid, p.65.

^[9] Ibid, pp.52-53.

在失去了三个孩子之后，赛兆祥陪同怀有身孕的妻子返回美国休假待产，直至1892年女儿赛珍珠出生才返回中国。此时，赛兆祥已经习惯于用娴熟的汉语进行日常的祷告了。

回国休假后，一次在美国的布道坛上，他起身走到一大群人面前祈祷，……祈祷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在用汉语祷告，他这才停了下来改用英语祷告……^[10]

据赛珍珠记载，这一时期赛兆祥还写作了一本关于汉语习语的小册子，遗憾的是笔者尚未看到相关的史料记载。

他曾经写了一本关于汉语习语的小册子，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是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写成的。^[11]

第二阶段是从1908年到1931年，赛兆祥从56岁到79岁去世。这期间，赛兆祥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汉语学习的课程设置和指导原则的文章，还独立或合作翻译了两部宗教文献《四福音书》和《新译新约》。如果说在第一阶段，赛兆祥实现了精通汉语的人生目标的话，那么在第二阶段，赛兆祥则不仅仅是一个汉语学习者了，他已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汉语学者和圣经翻译家了，他的成功得到了同工的认可和赞赏。

因此，安德鲁主意已定，只要时间允许，就着手把《圣经》直接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成汉语，而此时传教士们也认为应该重新翻译《圣经》，并且组成了编写委员会。他们赞赏安德鲁对于各种语言的精通，推举他为委员会的成员。^[12]

二、汉语方言与官话

学习官话抑或某种方言，是晚清传教士来到中国之际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赛兆祥初来中国之时，主要活动区域在杭州和苏州，1883年奉派至镇江，1887年至江苏清江浦开拓，足迹遍布运河流域的吴语地区和淮河流域的江淮方言区域。1887年3月，赛兆祥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华北及华东方言口语之差异》一文，他从自己学习江淮方言和北方话的切身体会入手，认为“学习这些方言，不仅对汉学家有意义，对那些整日与当地打交道的人传教士来说，也具有很高的实践性和实用价值。学习方言的最大好处在于提高理解不同方言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能力”。赛氏认为这对学生来说并非坏事，因为至少有一个好处——放下自以为掌握了这门语言的骄傲。可见赛氏清醒地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难度，并预判了学生们可能遇到的问题。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赛氏认为可以通过观察两种方言间的不同“规则”进行。赛氏举了“人”的例子，声称如果学生们学习的是北京话，当听到其它发音，如“yen、yin”时，就可以思考是否因为他们将声母变为

^[10] Ibid, p.52.

^[11] Ibid, p.52.

^[12] Ibid, p.181.

了“y”。赛氏亦将北京话作为标准，并与山东的济南府、青州府、烟台（芝罘，chefoo）三地进行了比较。^[13]

南方官话曾长期在全国占据优势地位。19世纪中叶以后，来华西士一面视北方官话为正统，一面仍不断对比南北官话。^[14]1887年4月，赛兆祥发表一篇题为《论南方官话》的文章，总结了南方官话的4个主要特点：

保留 i 及 v 前对 ts 及 k 的区分，而非都变为 ch；

总是能在 i 及 v 前找到 k 而不是 ch；

保留对词头 s 及 h 的区分，而非像北京话一样混用为 hs；

保留了短促的入声。

赛氏随后说：

南方官话看起来正迅速改变并接近北方官话，正如许多在南京的外国侨民所说的那样，大部分当地人在 i 及 v 前使用 ch 而非 k。^[15]

这正反映出19世纪末南方官话的优势地位已被北方官话替代。赛氏亦指出了许多传教士在发音方面的错误。文章结尾处赛氏写道：“对于年轻的初学者来说，比起盲从于自己未经训练的耳朵，跟随那些年长而又有智慧的专家是十分牢靠的。毋庸置疑的是，当学习者对语言逐渐熟悉起来以后，会发现专家们是正确的。”^[16]赛氏自身的汉语学习经验由此可见一斑。

种类繁多的方言在实际交流中极其不便，“特殊官话”便应运而生。6月赛兆祥发表《长江和运河的方言》一文，称“长江和运河的方言”为一种“特殊官话”，是一种“混合语”（lingua franca）。尽管不同地区有所差异，但具备一致的普遍特征。赛兆祥表示：“这是官话之贸易形式，且避免了北京话和南京话的差异。不同发音的数量被降至最低，保留下来的都是最简单和能够最快学会的。”^[17]赛氏随后列举了这门“特殊官话”首音及尾音方面的特点。至于这种方言的地位，赛氏对其大加肯定，他说：“从广泛的应用可以看出，比起南京话，人们更愿意将其作为南京官话。”^[18]同时，赛氏也预测了这种官话的发展情况：大的趋势是废除不必要的差异，确立一种可以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及水路沿线内部沟通的媒介。此外，赛氏亦描述了北方官话的普及程度——北方官话在北部省份广泛使用，此外亦包括湖北、四川、江苏北部及安徽。在汉口也能被相当好地理解，同时也是满

[13] A. Sydenstricker. Variation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of Northern and Central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pp.105-108.

[14] 参见姚小平：《近代北京话与南京话：17-19世纪西士笔下的北南官话之争》，《中国语文》2020年第4期，第504页。

[15] A. Sydenstricker. Southern Mandarin. *The Chinese Recorder*. 1887(4). p.154.

[16] Ibid, p.154.

[17] A. Sydenstricker. The Dialect Of The River And Grand Canal. *The Chinese Recorder*. 1887(6). p.226.

[18] Ibid, p.227.

洲里的标准语。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北方官话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定的地域特色，赛氏对此特别强调：“一定要避免北方官话中一些带有地方性色彩的表达方式，俚语和发音方面均是如此。”^[19]

翌年7月，赛兆祥又发表了题为《官话》的文章，他指出：“北京官话通常被冠以‘宫廷语言’（court dialect）之称呼，因此南京官话无法被称为官话。”而且，“身为权威，威妥玛也说北京官话在汉口理解度颇高。此外，居住在南京的传教士也说南京本地人在模仿北京官话”。另据赛兆祥自己的观察，北京官话正迅速而广泛地成为主流的官话形式。^[20]

纵观这几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赛氏对南北官话的差异有着较为准确的认知，一方面，他鼓励汉语学习者学习当地方言，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方言所具有的局限性，并积极推介避免南北官话差异的“特殊官话”，同时预言未来官话的发展趋势。此外，他亦清醒地认识到北方官话逐步取代南方官话主导地位的现象。

三、汉语学习的基本原则

汉语口语及书面语各具特点，对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学习进而正确认识并区分这两种语体十分重要。赛兆祥在来华近30年后，系统总结了传教士汉语学习的规律，以《传教士汉语学习指导诸原则》为题，发表在了1908年7月的《教务杂志》上。文章内容包括口语学习及书面语学习两大方面：

（一）口语学习

对于汉语口语学习之目标，赛氏认为：

要坚定地追求两个不可缺少的成果，首先要学习说出能够被周围人理解的话，而且不应只满足于让与他们交流的仆人、或是他经常去的教会上所遇之人理解，更要让他们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理解，让农村人及所有妇女儿童理解。^[21]

这其实对口语学习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至于如何判定传教士是否达到了所要求的口语水平，赛氏提出了一个测试方法——看能否让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年长妇女听懂所说内容。第二个目标则是让传教士学会轻松准确地理解他人所言。一言以蔽之，赛氏认定的汉语口语学习目标就是让人理解自己所说，同时做到准确理解他人。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赛氏提出了几种方法。首先，赛氏主张：“总体而言，学生一定要训练耳朵和舌头，即发声器官”。因为比起汉语的其它特征，更多的传教士败于发音或者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他认为许多人只是大致学习了发音，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准确地听辨。因此，为了能

[19] Ibid, p.227.

[20] A. Sydenstricker. *The Official Dialect. The Chinese Recorder*. 1888(7). p.300.

[21] A. Sydenstricker. *Some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Guide the Missionary in His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8(7). p.365.

够准确地听辨，初学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训练耳朵。赛氏认为学习者一定要有一位能够清晰发音的汉语母语老师。年轻的传教士应该从最开始便能准确而清晰地听到并且捕捉语音。^[22]

赛氏对汉语教师亦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无法容忍单调、愚蠢或者大舌头的老师。那些喜欢对学生说“差不多”的老师也无法被容忍。^[23]可见，赛氏倡导汉语教师对学生严格要求。除了拥有一位说话清晰的老师，赛氏还提出：

学生还应该有一张由老传教士制作的发音表，这张表格中的所有方言发音要同时带有拉丁化拼音和每一个发音相应的汉字。因此，为了表示所有声调，一个拉丁化拼音通常需要四个或者五个汉字。^[24]

学习的方法则是老师读表格，每个音都读得清晰而容易辨析，学生认真跟读。赛氏强调：“这项功课应该每天都做，直到学习者彻底熟悉所学方言的语音和声调。”赛氏认为如果身边有一位公认发音好的老传教士，那么于初学者而言，经常与老传教士的发音做比较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他在发音上有缺点或者瑕疵，他将永远不会成为说这门语言的理想之人。^[25]可见，赛氏重视口语发音，甚至直接把口语的好坏与汉语水平的高低划等号。

除了发音，赛氏认为学生们还要掌握结构，或者把词结合成短语和句子。对于词汇，赛氏亦有自己的一套选择标准：不使用当前俗语中不常使用的书面语词汇或者表达方式。此外赛氏亦强调：“不应学习层次太低的土话，因为不论是在发音方面还是在词汇的运用方面，这都是无益的。”赛氏主张学习那些直接说给中国人而非为了适应外国人而说的语言。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在任何话题上自由交谈。当学生们取得了一定进步并且能够阅读一些普通基督教书籍后，赛氏认为他们也应该阅读一些由母语者编写的官话和口语书籍。^[26]

赛氏特别强调用汉语思考的重要性。他说：“学生们必须学会用汉语思考，否则就不能认为其完成了语言学习。”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是把想法从外语翻译成汉语，其语言和思想都会带有外语的痕迹。这其实与“直接法”所倡导的方法不谋而合，即不通过媒介语学习第二语言，而是直接建立语言与思维的联系。赛氏主张：“或许汉语学习最终和最难的要求之一便是用汉语思考和写作，且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说话。”虽然学习不易，赛氏亦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即对中国人讲汉语应该如同对英国人讲英语那样自然和容易。赛氏亦比较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及母语学习不同，认为许多传教士的子女从婴儿开始就同时学习英语及汉语，孩子们可以自然而无意识地讲这两门语

[22] Ibid, p.365.

[23] Ibid, p.367.

[24] Ibid, p.367.

[25] Ibid, p.367.

[26] Ibid, pp.371-372.

言。他们不会先用英语思考，然后把想法翻译成汉语。在这方面传教士们应该向自己的子女学习。

[27]

(二) 书面语学习

书面语学习方面，赛兆祥亦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

学习者首先应该了解一些古典文学，尤其是四书。因为老百姓所说的许多短语和句子都能从古典作品中找到出处。此外，有许多常使用的句子也是以古典作品为原型形成的。更为重要的是，学习者要掌握日常写作风格，应该可以毫无困难地阅读报纸、官方告示等。而为了掌握现代书面语风格，夏德^[28]的《文件汉语》是一门很好的入门课程。其次，阅读报纸、官方告示和任何可以拿到手的用这种风格写成的作品。为了能够做好传教工作，要做语言的持续学习者。^[29]

把四书五经等著作当作高级汉语来学习，而非为了文学而文学，为了古典而古典，是赛氏汉语书面语学习的核心主张。虽然就篇幅而言，赛氏对汉语书面语学习的讨论明显少于对口语学习的讨论。毕竟，对晚清来华传教士而言，与中国人交流以及口头传教所占时间要远多于使用书面语的时间，口语学习就显得比书面语学习重要得多。此外不难发现：来华西士学习汉语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哪些方面对传教帮助大，就优先学习那些内容。

四、对汉字拉丁化的思考

汉字拉丁化在近代中国语言文字发展中被反复讨论，其肇始则源于西人的汉语学习。传教士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甚至是汉字拉丁化主张的重要群体。《教务杂志》中亦有不少与汉字拉丁化相关的篇目。例如高第丕^[30]发明以注音字母学上海方言的方法，他于1888年3月在《教务杂志》发表《书写中国方言的语音标记系统》一文，详细介绍了语音系统的起源、首音的标记、尾音的标记、使用英文字母的语音等方面。^[31]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于1898年11月发表《书

[27] Ibid, p.373.

[28] 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德国人，汉学家。1902年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赴美任该校第一任汉文教授。著有《中国和罗马人的东方》（1885）、《中国研究》（三卷，1890）等书。

[29] A. Sydenstricker. Some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Guide the Missionary in His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1908(7). p.374.

[30] 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 1821-1902），美国南浸信传道会教士，1852年来华。发明以注音字母学上海方言的方法。

[31] T. P. Crawford. A System of Phonetic Symbols for Writing the Dialects of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1888(3). pp.101-110.

写汉语的非语音和语音体系》一文,介绍了最新的汉语书写方法,该法由莫维廉^[32]发明。^[33]据笔者爬梳,首篇讨论拉丁化的文章出现于1888年1月,内容是关于官话拉丁化的,作者正是赛兆祥。与他的众多同工同胞不同,赛兆祥是拉丁化的反对者。他在文章中论证了研制一门通用的拉丁化方言不具有可行性,同时指出设法进行汉语官话的拉丁化与传教工作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

赛兆祥对汉语拉丁化的意见与大部分传教士相左,据研究,同时期传教士中仅有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 1850-1924)^[34]的看法与之接近^[35]。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汉字拉丁化的呼声甚嚣尘上,我们依然不可忽略不同的声音,赛兆祥即是其中的代表。

五、结语

作为晚清来华传教士中的一员,赛兆祥在华逾半个世纪,最终埋骨华夏。作为一名汉语学习者,赛兆祥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论述,这些论述时至今日依然值得采撷。赛兆祥自来华前即开始学习汉语,坚持不懈,成果颇丰。他敏锐地把握了19世纪末北京官话逐步取代南京官话的趋势,结合自身汉语学习的经历及其对汉语语言的感悟,提出了诸多汉语学习的构想。而他对汉语拉丁化的反对,则恰恰说明了其超乎时代的前卫主张,他同时也为汉语教学机构的发展积极建言。^[36]总体而言,在汉语学习领域,赛兆祥可谓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我们期待发掘更多史料,进一步完善对赛兆祥的个案研究,同时丰富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

参考文献

- Batalden, Stephen K.&Cann, Kathleen & Dean,John(2004) *Sowing the Word: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04-2004*, Sheffield: Sheffield Phoenix Press.
- Buck, Pearl S.(1972) *Fighting Angel*.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 Crawford, T. P.(1888) A System of Phonetic Symbols for Writing the Dialects of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19(3).
- Richard, Timothy(1898) Non-Phonetic and Phonetic Systems of Writing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29(11).

[32] 莫维廉(Murray William Hill, 1843-1911), 苏格兰人, 1871年来华, 任苏格兰圣经会代理人。1874年创办北京盲人学堂。

[33] Timothy Richard. Non-Phonetic and Phonetic Systems of Writing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1898(11). pp.540-545.

[34] 详见邹王番:《美国传教士潘慎文汉语学习研究》,《东亚文化研究科学院生论集》第10号,2020年11月,第49-62页。

[35] 同上。

[36] 详见邹王番:《清末民初新教汉语教学机构研究——以英文期刊<教务杂志>为中心》,《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14号,2021年4月,第305-315页。

- Sydenstricker, A.(1887) Variation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of Northern and Central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18(3).
- Sydenstricker, A.(1887) Southern Mandarin. *The Chinese Recorder*, 18(4).
- Sydenstricker, A.(1887) The Dialect Of The River And Grand Canal. *The Chinese Recorder*, 18(6).
- Sydenstricker, A.(1888) Romanizing The Official Dialect. *The Chinese Recorder*, 19(1).
- Sydenstricker, A.(1888) The Official Dialect. *The Chinese Recorder*, 19(7).
- Sydenstricker, A.(1908) Some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Guide the Missionary in his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39(7).
- Sydenstricker, A.(1912) Language Study Classes. *The Chinese Recorder*, 43(4).
- 郭柳生 (2015) 近代中国基督徒精英的量化研究——以贝德士《中国基督徒名录》为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黄光域 (2017) 《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 (1807-1949)》,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姚小平 (2020) 近代北京话与南京话: 17-19 世纪西士笔下的北南官话之争, 《中国语文》第 4 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1981)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邹王番 (2020) 美国传教士潘慎文汉语学习研究, 《东亚文化研究科学院生论集》第 10 号.
- 邹王番 (2021) 清末民初新教汉语教学机构研究——以英文期刊《教务杂志》为中心, 《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 14 号.

A Study on the Chinese Study of American Missionary Abosalom Sydenstricker

Zou Wangfan, Shi Zhengyu

(1. Kansai University, Osaka 564-8680 Japan; 2.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American missionary Abosalom Sydenstricker who came to China, while spreading the Gospel, he also tried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and translated religious literature. Abosalom Sydenstricker published several articles related to Chinese language study on English journal *The Chinese Recorder* which was founded by westerners who came to China, including Chinese mandarin and dialects,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Latin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courses and etc. These discussions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oday.

Key words: Abosalom Sydenstricker;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Chinese language study; *The Chinese Recorder*